

人是

蒋孔阳 / 著

世界的美

RENSHISHIJIEDEMEI

RENSHISHIJIEDEMEI

S

沈阳出版社

◎ 复旦大学文艺学美学研究文丛

人是

蒋孔阳 / 著

世界的美

RENSHISHIJIEDEMEI

RENSHISHIJIEDEMEI

S

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是世界的美/蒋孔阳著.—沈阳:沈阳出版社,2003.8

(复旦大学文艺学美学研究文丛)

ISBN 7-5441-2090-2

I.人… II.蒋… III.文艺美学—文集 IV.I0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1815 号

蒋孔阳先生简历



男,1923年1月生,1999年6月逝世。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上海市社联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美学学会会长。主要著译有:《德国古典美学》、《近代美

学史评述》、《美与美的创造》、《美学新论》、《蒋孔阳全集》(4卷本)等十多种,在国内外美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与威望。

作者简介

蒋孔阳(1923-1999),男,汉族,四川万县人。中国当代著名美学家。1946年毕业于前中央政治学校经济系,1951年从海光图书馆调到复旦大学新闻系,次年院系调整,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从事美学和文艺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历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文艺学国家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上海美学学会会长、上海社联副主席、《复旦学报》(文科)编委会主任等。有《美和美的创造》、《形象与典型》、《德国古典美学》、《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美学与文艺评论集》、《蒋孔阳美学艺术论集》、《美学新论》、《文艺与人生》、《蒋孔阳全集》等著作面世,发表论文300余篇,主编《哲学大辞典·美学卷》、《辞海·美学分册》、《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西方美学通史》等著作,另出版译著《近代美学史评述》等。1991年,获得“上海市首届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的殊荣。

卷首语

蒋孔阳是一位融人、生命、学问和美于一体的美学家。在他看来,美在创造中,人生在觉醒中,美学也在觉醒中。本文选中的论文通过对一系列美学问题的探寻和思索,在顺应和融汇中外美学思想传统的基础上,立足于人类的生命实践活动和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提出“美在创造中”和美是“多层累的突创”等命题,揭示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特质在于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和全面解放,强调感性、形象和情感与幸福生活的内在联系,演化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范式和思想内容;在中西美学比较上注重“生活方式→精神面貌→艺术实践→美学思想”这样一条整体研究的道路,在学术精神上崇尚“理智的谦虚”,在治学上追求“为学不争一家胜,著述但求百家鸣”,其美学思想曾被誉为“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的总结形态”。

目 录

我与美学	1
在人生选择的道路上	8
治学的三点体会	11
读书人的追求是觉醒	16
且说说我自己	23
只要有路,我还将走下去	34
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	38
对于美的本质问题的一些探讨	50
人是“世界的美”	57
美在创造中	70
美是自由的形象	82
美感的心理功能	91
论崇高	113
谈谈审美教育	126

审美欣赏点滴谈	136
旅游与自然美	140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环境艺术	143
美学的转变与守恒	145
 评老子“大音希声”的音乐美学思想	 147
歌德论自然与艺术的关系	155
唐诗的审美特征	182
外师造化 中得心源	193
“形似”与“神似”	204
加强作家主观的人格力量	215
需要一颗把生活燃烧起来的心	221
通俗文学与高标准	225
戏要有“戏”	227
杂谈审美文化	230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	233
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体系的建立	237
改变陈旧的审美心态	242
编后记	245

我与美学

我与美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其实出于偶然。至今想来,往事渺茫,很难全部说得清楚。我只知道,我于1923年1月23日出生于四川万县三正乡苦葛坝。这是一个十分闭塞的地方,周围全是山。一座山高过一座山,最高的山仰头都看不到巅。在这样的环境里,不仅看不到电影、戏剧和舞蹈,甚至连唱曲的,也很少光顾。我父亲因为偶尔要给农民看看病,家中除了二三本破旧的医书外,什么书都没有,自然也没有文艺作品了。因此,我不像有的先生是从文艺走向美学的。如果我也谈得上受到过什么美的熏陶的话,那么就是我家乡的那些山,以及山间的泉水、树木和白云。小时候,我很喜欢爬山。常常爬了一座山,又爬一座山。夏天傍晚,爬到山顶,看那群山万壑,红霞满天,真是如醉如痴,欣喜若狂。或者我沿着山中的小溪走去,满溪乱石,间有悬湍,那味道也是够我回忆一辈子的。至于风起的时候,松涛怒吼,山鸣谷应,更有一种说不出的心灵的震颤。因此,是自然的色彩与声音,是自然的美,启发了我对于美的向往和追求。

我大学读的是中央政治学校经济系,地点在重庆南温泉。这是一个风景极其秀丽的地方。旖旎的花溪,奔腾的虎啸口,曾经使我整天徘徊徜徉。然而,经济系的课程,却怎么也引不起我的兴趣。于是,我抛开课堂,走进图书馆,任意地翻读我所喜爱的文史哲方面的书。我特别爱读那些富有哲理性的文艺作品,又特别爱读那些富有文艺性的哲学著作。宗白华的《行云小诗》和他的《中国艺术意境

之诞生》等论文,方东美的《科学哲学与人生》,以及屈原和陶渊明的诗,等等,就这样成了我当时最喜欢读的一些书。我曾写信给宗白华先生,向他请教。我也曾把屈原和陶渊明对比起来进行研究,探讨他们不同的艺术风格和人生态度,特别是探讨他们不同的悲剧命运。屈原执着、认真,造成了悲剧。陶渊明淡泊、洒脱,也造成了悲剧。这或许是我下意识地走向美学的第一步吧。1946年,我大学毕业后,来到南京。有一天,我到夫子庙逛旧书店,猛然间发现了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不知怎的,书的名字就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我,我把身上仅有的几个钱,全部掏了出来,买了书就走。从此以后,我知道天地之间还有一种学问叫美学,而我自己也就朦朦胧胧地爱上了美学。不过,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我将来会致力于美学的学习与研究。1948年5月,林同济先生邀请我到上海海光图书馆去当编译。林先生这个人,从气质上讲,就是美学型的。他胸襟开阔,知识丰富,具有极高的鉴赏力。他常常对我谈中国和西方的绘画、园林、建筑等。例如有一次,他指着米开朗基罗的《创世纪》说:“上帝用手一指,马上就有一个亚当,蜷缩着产生。你看,多有力量!”这话,给我的印象那么深,以至像刀刻的一样,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又有一次,我们到复兴公园去玩。他说:“复兴公园的风格与兆丰公园的风格,完全不同。复兴公园是法国型的,古典型的,讲究整齐和雕琢。兆丰公园则是英国型的,因为受了中国园林的影响,讲究曲折和自然,讲究丘陵和起伏。”这些话,像闪电一样地在我脑海中穿过。它们在我走向美学的道路上,无疑起了很好的推进作用。

但是,我真正走向美学,从事美学的工作,还得从1951年我调到复旦大学开始。调到复旦以后,一方面,我担任了大量的文艺理论和美学方面的教学工作;另一方面,我开始写美学文章,出版美学

方面的书,参加各种各样的美学学术活动,等等。我的身份也愈来愈明确地变成了复旦大学的美学教授。我与美学之间,似乎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我从事美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倏忽之间,已经40年了。40年来,有多少的曲折和困难,有多少的辛酸和苦辣,这些就不必细说了。我惟一感到惋惜的,是我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发挥自己的水平,去有意识有计划地搞一些课题,而是采取“守株待兔”的方式,人家叫我搞什么,我就搞什么。结果,大好的时光像流水一样白白地流淌过去了。

50年代,我国第一次掀起美学讨论的热潮。我也写了几篇文章,参加讨论。但不过浅尝即止,没有深入下去。我选了几篇,收进了我的《美和美的创造》一书。当时,批判性比较强,动不动把对方诘难一通。记得有一次朱光潜先生到上海来,《文汇报》邀请朱先生和几位搞美学的同事,举行座谈。有一位青年人,当场就以“革命”的姿态,向朱先生进行“诘难”。弄得朱先生相当尴尬,也比较紧张。轮到我发言,由于我当时也还比较年轻,我一称朱先生,朱先生的耳朵立刻竖了起来,他大概以为我也要进行“诘难”了。但是我没有。我谈的是过去读过朱先生的书,受到过很多教益,今天难得见到朱先生的面。朱先生的神情马上松弛下来了。五六十年代,人们的精神状态反映到学术当中来,学术的讨论有时也显得不那么平静。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美学的讨论,才能够比较心平气和,从而掀起一次又一次的高潮。

我的美学研究工作,是和教学工作密切联系在一起的。50年代,我主要教文艺理论。60年代,我改教《美学》和《西方美学》。这对我来说,无异是回到了“自己的园地”,非常高兴。我先备课,写成讲

稿;然后上课,然后编成讲义。恰好这时,商务印书馆来组稿,要我写一部《德国古典美学》。我答应了,就在讲义的基础上,加以修改和补充。大约1965年完稿,我把稿子寄了去。编辑部回信,准备出版。但哪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四人帮”摧残文化,还有什么出版可言?我这部书稿,就这样埋藏在编辑部,一埋埋了十多年。“四人帮”垮台后,我写信给编辑部,把稿子要了回来,进行了一次认真的大修改,终于在1980年出版了。书问世后,引起了较大反响。大约是1986年夏天,有两位台湾的年轻朋友,忽然到我家来看我。他们说,他们在美国读到我的《德国古典美学》,感到比较满意。他们到处打听我是谁?有人告诉他们,我在上海复旦大学。于是,他们就来看我了。同时,他们又告诉我:台湾谷风出版社已经翻印了这部书。他们问我收到书和稿费没有?我说不知道。他们热心地自告奋勇,要帮我去联系。结果,谷风出版社果然寄来了两本样书,和一百美元的象征性的稿酬。对于这两位年轻的朋友,直到现在,我还十分感念。

另外,我写了一部《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这部书,是“文化大革命”中“靠边”靠出来的。“文化大革命”不要文化,连看书都很困难,遑论写书?但是,天下不可能的事,常常发生在意想不到的地方。1975年,我从“干校”回到学校,而且回到了教研组。那也就是说,我恢复了教师的身份。但是,我既不能教书,也不能参加任何教学的活动,我成了“靠边”的“闲人”。我无事可做,于是,天天上图书馆。我阅读古代的史书。在阅读的当中,我发现我国古代的音乐特别发达,而且有关音乐的言论和思想也特别多。我乃加以搜集和整理,不知不觉之间,竟写出了《阴阳五行与春秋时的音乐美学思想》一文,开始了先秦音乐美学思想的研究。我不是为了发表而写作,

我只是为了学有一点心得而写作,这样,我就可以讲点真话。由于种种原因,书到1986年才出版。我向出版社订了二百本,可是出版社说,书只印了三千册,只能给我一百本。

80年代,我还出版了两部美学论文集:一是《美学与文艺评论集》,一是《蒋孔阳美学艺术论集》,收录了80年代我发表的一些比较重要的美学文章。目前,我正在写《美学新论》。这部书,早在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来组稿了,可是,因为其他事情的干扰,老是完成不了。我老伴看了,说我是为了看门诊,忘记了正经病人;说我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老伴的话,我认为是对的,但是,我又无可奈何,只好听它去。所幸十多年过来,我总算拼拼凑凑,快要完稿了。“十年辛苦不寻常”,这部《美学新论》虽然谈不上什么“不寻常”,但的确是我“十年辛苦”的产物啊!

为什么叫“新论”呢?“新”在哪里呢?我说,这不过是表明我的一点心意,希望能够写出一点“新意”来。至于是否真的能够写出一点“新意”,那得由读者们去审判和指教了。同时,我所说的“新”,既不是新奇的新,更不是从来没有人谈过的新,它首先是“温故而知新”的“新”。也就是说,这种“新”,是从“故”当中来的。因此,介绍历史上的知识,加以整理和继承,然后从过去的经验中,总结出一些东西来,这就是“新”。这样,历史性和知识性,成了我这本书所追求的第一个目标。其次,王羲之说:“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那就是说,天下万物,五彩缤纷,杂然并陈,似乎没有什么新鲜之处;但是,如果我们以自己独特的感情和眼光,去加以真实地感受和体验,便会发现,整个世界,生生不已,到处都充满了新鲜感。例如西湖,没有人类以前,它就存在了。不知有多少人欣赏过,咏叹过。但我们并不因为这样,就觉得它旧了。我们每一次来到西湖,都会充

人是世界的
美

满了活蹦乱跳的新鲜感。这就因为,每一次都有我们独特的感受。做学问,离不开人情世故和典籍资料,但更可贵的是独特的感受。因为感受不同,各人所发掘出来的体会和意味,也就大不相同。这不同的体会和意味,就是各人的“新意”。因此,“新”离不开独特的感受。我这本《新论》,卑之无甚高论,但我之所以觉得它新,是因为它处处有我自己的感受。它们处处都带着我身体的温暖,浸渍着我自己的汗水和感情。旁人可能觉得无非是老生常谈,而我自己却的确是出之于肺腑,出之于全身心的真诚。再有,综合比较,可以出新。老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我认为,学问的好坏,也是从比较中比出来的。一是相互之间进行比较,二是与客观现实相比较。一比,谁真?谁假?谁符合客观的现实?谁最能回答客观现实之中所提出来的问题?不就比出来了吗?这比出来的,是客观的事实。不为人知的事实,被你发掘出来,成为人所共知的事实,这就是“新”。因此,“新”不是来自天外,不是来自主观的想像,而是来自客观的事实。

1980年到1981年,我到日本神户大学担任客籍教授,为期一年。1988年八九月之间,我应邀到英国诺丁汉大学去参加第11届国际美学会议,顺访了伦敦和巴黎等地。就从这几次的外出,我感到了世界的大,也感到了世界的小;感到了世界的同,也感到了世界的异。许多国家各有他们的制度文化,各有他们的风俗习惯;真是千差万别,不能不惊叹世界的大。但是,不管怎么大,现代交通工具缩短了彼此的距离,这又不能不说人类的地球毕竟还是小的。在相互交往之中,彼此发现,不仅相异,而且相同。拿美学来说,爱美差不多是人类的天性,中国人爱美外国人也爱美。中国人有文学艺术,外国人也有文学艺术。而且中国人认为美的文学艺术作品,如

像敦煌的石窟、梅兰芳的京剧,外国人都都认为美,差不多也都能够欣赏。反过来,外国人认为美的文学艺术作品,如像莎士比亚的戏剧、凡尔赛宫的绘画,中国人都都认为美,差不多也都能够欣赏。这说明中外之间,虽然异,各有自己特殊的美学爱好,但毕竟都是人,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之上,因此,彼此之间又有相同的地方。正因为有相同的地方,才可以进行比较,进行交往。不过,由于各自的文化积累和传统不同,各自形成了不同的民族特色。这一民族特色,无论怎样交流和相互补充,都是没有办法抹煞得掉的。这样,一方面要求改革开放,要求大量引进和借鉴外来美学思想;另一方面又要求积极发扬中国美学思想的民族传统,民族特色。我自己所走的,就是这样一条道路。

我在研究美学的过程中,碰到的曲折和困难是不少的。有的来自于业务,有的则来自于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最后还有生活和身体方面给我带来的困难。这是“天意”,无法违抗,只能顺天安命。但不管怎样,我将背负着困难的十字架,一步一步地朝前走去。

在人生选择的道路上

在人生的道路上,面临着许多的选择。有的选对了,有的选错了。我这一生,有过许多错误的选择,它们给我带来痛苦和灾难。但是,我选择美学和文艺理论作为我的终身职业,我认为还是基本上符合我的性格和兴趣的。因此,虽然我并没做出什么成绩,但扪心自问,也还心安理得,没有什么大的后悔。

不过,我之所以选择美学和文艺理论,并不是自觉的,更不是有计划的,而是误打误撞,不知不觉地选上了这么一条道路。我这个人,照心理学的讲法,应当是属于感情型或内向型的。我对外界事物缺乏敏感,对人际之间的周旋更是缺乏才干,我喜欢过孤独的内心生活。小时候,我很少参加集体活动,常常一个人漫步在田野里、丛林间。我会无缘无故地站在小溪的旁边,痴痴地发呆。我更会无缘无故地产生出一种无名的感伤,流出一种无名的眼泪。整个大千世界,对我来说,似乎都充满了一种无从诉说的感情。夏天的晚上,我尤其喜欢躺在农家的院子里,仰望着太空,放纵着想像。我这种性格,看起来似乎是文学型的,适宜于搞创作。但是,不!文学家除了要有丰富的感情外,还要有敏锐的观察力,还要有善于把丰富复杂的世界重新加以塑造成为生动可感的形象的能力。这两种能力我都没有。我既不善于观察,又不善于塑造,我只能欣赏文学作品,而不能创作文学作品。我的感情不是与作家的观察力和创造力结合在一道,而是与理论家的推理力和综合的想像力结合在一道。正因为这样,所以我既没有走文学艺术创作的道路,也没有走科学哲学理论的道路,而是走了介于它们二者之间的边缘科学美学和

文艺理论的道路。

我走上这样一条道路,也并不是因为我有先见之明,能够预卜自己未来的命运。不!完全不是这样。我惟一的凭借,是我的爱好和兴趣。我感到一个人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常常是一个人的性格和才能的标志。因此,在人生选择的道路上,按照自己的爱好和兴趣去做,不说是绝对正确,至少是大致不错。我还在读高中的时候,就喜欢文史哲,而不喜欢数理化。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执着地要走文史哲的路。进了大学,我进的是经济系,可我怎么也培养不起对经济的兴趣。于是,我干脆放弃经济,凭着兴趣,读文史哲方面的书。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银行。银行在当时是“金饭碗”。照理说,我应当心满意足。可是,我不满足。我的兴趣推动着我,要我离开银行。直到我转到了上海海光图书馆,可以亲近我的“文史哲”,我方才定了心。解放后,我调到复旦大学中文系,从事文艺理论的教学工作,以后又教美学。这样,工作和兴趣结合了起来,我觉得我已没有什么可以埋怨的了。

但是,由于我性格中另外一面的缺点,对外界缺乏敏感和不谙人事,却给我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和局限。大批判,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例子。当我遭到大批判时,我的确曾经一度后悔我不该选择美学和文艺理论的道路,我认识到它们太“危险”了。但是,我仍然拗不过我的性格和兴趣。即使在大批判中,甚至在“文革”的批斗和劳改中,我仍然没有放弃我的美学和文艺理论。真是自己的性格决定了自己的命运,福是它,祸也是它。我这一生,已无从后悔,只能生死由它了。

我写文艺理论方面的文字,是从书评开始的。高中时,我发表过有关鲁迅作品的短文;大学时,我在杂志上发表了评论罗曼·罗兰《米开朗基罗传》的文章。当时,我花力气最多的,是写一篇《屈原